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 主编

《大公报》  
与  
近代中国社会

---

侯杰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11 工程建设项目

ISBN 7-310-02525-3



9 787310 025251 >

ISBN 7-310-02525-3

K: 123 定价: 28.00 元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 《大公报》与近代 中国社会

侯 杰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 侯杰著. —天津:南开  
大学出版社, 2006. 4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ISBN 7-310-02525-3

I. 大... II. 侯... III. 大公报—研究  
IV.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086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2 插页 364 千字

**定价:2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 目 录

<b>第一章 导论——秉笔直书写大公</b>	1
第一节 他山之石——研究动因与理论构想	2
第二节 有容乃大——学术回顾与研究现状	11
第三节 循近世之事 辟今昔之理——研究思路与基本架构	20
<b>第二章 无冕之王——英敛之</b>	26
第一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英敛之早年思想及人生经历	27
第二节 “忘己之为公，无私之为大”——《大公报》鹊起中国	37
第三节 “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英敛之的办报理念	51
第四节 “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大公报》的舆论监督	56
<b>第三章 文人论政——《大公报》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参与</b>	66
第一节 改良主义——中国之顶门针、对症药	67
第二节 君主立宪——拯救中国之不二法门	82
第三节 革命者——不同情境下的媒体表达	99
<b>第四章 “开风气，牖民智”——《大公报》与近代中国民智启蒙</b>	118
第一节 通文字之用 开民之智识——白话文的倡行	119
第二节 “欧风美雨驰而东”——西方文明与现代生活的展示	132
第三节 “风移俗易”——剪辫易服及其他	140

<b>第五章</b>	<b>用“她”身体书写历史——近代中国社会性别</b>	156
第一节	抛掉千年的裹脚布:劝戒缠足	157
第二节	挣扎的婚恋自由:嬗变中的近代婚姻	171
第三节	独立生存的权利:报纸媒体与兴办女学	183
<b>第六章</b>	<b>合群结社拓展公共空间——近代社会团体</b>	206
第一节	开蒙教化、获取新知的场域——阅报社之推广	207
第二节	互动与双赢——《大公报》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功实践	222
第三节	“强壮国民的体魄,振刷国民的精神”——天津普通体育社之宣传	245
<b>第七章</b>	<b>道成华身的救赎——《大公报》中的丁义华</b>	265
第一节	在“父母之邦”追求“世界大同”——丁义华及其社会改良观	267
第二节	洗净“烟气”,振兴“民气”——丁义华与清末禁鸦片、戒纸烟	286
第三节	共和初兴,烟毒必除——丁义华与民初政治和禁烟风潮	304
<b>第八章</b>	<b>“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评析——《大公报》与近代中西宗教和信仰习俗</b>	317
第一节	爱国与爱教——英敛之、《大公报》对西方宗教的推崇	318
第二节	“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大公报》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认知	337
第三节	复杂的遗存——《大公报》对中国民众信仰习俗的批判	351
<b>第九章</b>	<b>人能补天——《大公报》与近代防疫和赈灾</b>	363
第一节	公共防疫与社会参与——1902年霍乱瘟疫防治	364
第二节	善与人同——1907年水灾救赈	376
第三节	树公共卫生之基——1910~1911年鼠疫防治	386
第四节	未曾相忘于江海——《大公报》与1917年水灾救赈	404

# 第一章 导论——秉笔直书写 大公

克罗齐言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而言，所叙述的无非是早已尘封的历史事实，然而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所做出的解释却不尽相同，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也。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推进，历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一方面，在传统史学的范畴内，许多过去被忽视与研究甚少的领域，开始得到较多的关注；另一方面，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被“当代”学者发现并展开深入探讨；再者，随着社会科学领域学科边界日益消融，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潮流兴起，历史学研究更多地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彼此借鉴、融合，形成对话，从而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史料挖掘都产生重大影响。凡此种种，均构成了当代历史学研究的新景观以及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在当代历史学多元化研究的格局中，笔者选取了英敛之、《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为研究题目，希冀通过媒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展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大公报》浩瀚的资料，为这一设想变成现实奠定了牢固的史料基础。不仅如此，由于《大公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记录具有丰富性、涵盖性、选择性以及时代性等特征，从而使透过媒体与社会互动这一视角所进行的研究，不仅能够很好地展示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而且从一个相对广阔的领域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传播学作为近年来崛起的新兴学科，提出

许多关涉媒体的理论与方法，极具启发性，有助于深化对于报纸媒体《大公报》的研究。因此，笔者以比较审慎的态度，有针对性地加以采用。同时也希望对于《大公报》的历史研究，能够对日新月异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社会性别史、基督教史研究以及媒体与社会的探讨有所贡献。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史的目的》中写道：“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sup>①</sup>寥寥数语道出了历史学研究的真谛。梁启超的这句名言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正是寄托了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当代”的阐释之希望，赋予尘封的“过去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

## 第一节 他山之石——研究动因与理论构想

天津，地处渤海之滨，在近代以前就已是一个传统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商埠。自19世纪60年代成为约开口岸<sup>②</sup>以后，天津逐渐发展为北方最为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同时也成为中国较早接触和吸纳西方文明的近代都市。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不得不做出一些应对。当“变亦变，不变亦变”历史潮流汹涌澎湃时，天津固有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宗教观念、生活方式等也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以华洋交错、新旧杂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环境，成为向中国人展示近代西方文明的重要窗口。此外，天津的地缘政治优势<sup>③</sup>，又使这座商埠城市拥有一些其他通商口岸所不具备的条件，可谓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sup>②</sup>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等列强逼迫清朝政府于1860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口岸是列强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开放的，统称约开口岸。

<sup>③</sup> 近代天津既是清朝政府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驻节之地，又是与中国政治中心北京相距最近的大城市。

得天独厚。在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中，很多“自强”、“求富”的洋务举措都率先在天津实践和开展，诸如新式企业的建立、铁路的修建、电报的架设、新式学堂的建立和新式人才的培养等等，开华北乃至全国风气之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津是推动洋务运动在北方发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城市。

洋务运动所产生的人才聚集效应，又使天津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严复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严复自1880年起即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教职，前后长达二十年。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为维新变法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95年，严复连续发表了《原强》等多篇政论文章，又译出了《天演论》，使天津逐渐成为北方传播维新思想和进化论的中心。1897年，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在天津自办的第一份报纸，与上海的《时务报》遥相呼应，是宣传维新派思想和主张的重要报纸媒体，更使天津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地区之一。

经过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和充斥着腥风血雨的八国联军入侵，至20世纪初，清朝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新一轮的社会改革随即展开。作为京畿门户、直隶省治的天津成为实施新政的“实验场”，许多深具近代意义的机构、制度纷纷得以建立和实施，推动着天津地方社会发生更为剧烈的变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所推行的北洋新政和地方自治，成为全国纷纷仿效的“样板”，对天津地方社会发展以至中国政治走向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大公报》正是在天津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诞生的著名报纸媒体。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报纸媒体的产生也是天津地方社会持续现代化的结果。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正式创刊了。自创刊之日起，《大公报》便致力于开启民智、伸达民隐、抨击权贵、讥评时政，很快就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媒体，日发行量一度达到五千份。这一报纸媒体作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重要舆论力量，以新闻与评论的方式详细地记载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华北、天津本埠所发生的

重大历史事件或琐碎的大事小情，记录下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它所提出的兴立宪、戒缠足、发展新式教育、推广白话文等一系列社会改良主张，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风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时局动荡，这份报纸几经兴衰，辗转许多城市，曾先后或者同时在上海、重庆、桂林、香港、北京出版过，其影响力几乎遍及全国，至今仍然在香港出版发行。2002年6月17日，《大公报》度过了其百年华诞。这份历经百年沧桑的报纸成为存在时间最长、发行范围较广、影响甚大的中文报纸，可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季羨林先生为《大公报》百年庆典所书写的那样：

《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二十世纪；从第一期刊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作为唯一一份具有百年历史的中文报纸，《大公报》见证了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至今所历经的沧桑变化。“通过呈现不同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媒体提供了有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详细资料。”<sup>①</sup>不管是惊天动地的剧变，还是潜移默化的渐变，《大公报》都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而这正是媒体的主要功能之一。同时，《大公报》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其存在本身，包括其与社会的互动，都显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公报》作为报纸媒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生生不息，这种历史现象本身，即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大公报》本身就是一个亟待深入开掘的“宝藏”，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就学术兴趣而言，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十分关注长时段历史的发展变化，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发展以及社会风习的悄然变迁，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以及风俗、信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并且十分关注报纸媒体是以怎样的角度和方式

---

<sup>①</sup>【美】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去观察、评介甚或引导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推动社会的变革。自90年代初期起，笔者开始对《大公报》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这不仅与自身多年来关注和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术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对于任何一位视学术研究为生命的文化学者而言，这样一份内容丰富、言论犀利的历史纪录实在是具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近代是中国社会转型非常剧烈的时期，许多相关历史问题都十分值得研究，而《大公报》中记载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大量历史信息，因此，成为研究和探讨报纸媒体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极好的切入点和论述场域。透过报纸媒体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也可以带来一种新的思路和研究途径，足以弥补以往研究中的缺憾，丰富乃至纠正以往的某些认识，更重要的是在解决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之同时，发现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从而加深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当然，对于报纸媒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其中必然涉及对于媒体的理解。就近代报纸媒体而言，大致是由这样几部分组成：媒体本身（报纸）、媒体制造者（报人或发行者）、媒体反应者（读者）和媒体环境（社会）。作为语言和交流最具典型性的载体之一，报纸媒体既是一种客观的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又是形成、复制、扩散和强化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受客观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形式或尚未成为一种成熟而普遍的传播方式，或根本还未出现。相比较而言，报纸媒体拥有着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在社会中更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正是基于这样的优势，报人得以利用他们在社会中享有的资源以及所掌控的话语权，借助报纸媒体来向某些社会群体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具体来讲，报人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价值判断，及时迅速地在社会中采撷信息，并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将这些信息制造成具有可理解性和可扩散性的信息群，向社会中尽可能广泛的群体散发开去，由此在社会中创造了一个有别于官方的公共舆论空间，使各种信息成为这一空间和群体关注的中心，从而在某种

程度上使得“大众可以参与，影响到公共政策并且可以批评政府”<sup>①</sup>，由此引导了舆论方向，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媒介文化<sup>②</sup>。

不可否认，包括报纸在内的大众媒体在引导和制造舆论的时候，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性。这一方面来自于媒体环境（国家和社会）的压力，比如官方力量对报纸媒体的审阅与查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市场的利益诱惑，即媒体反应者（读者）的兴趣和爱好对媒体的言论倾向、格调趣味的左右；而更大的危险则来自于媒体制造人（报人）自身，这一点在近代社会语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处于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中，来自清朝政府的官方压力和影响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同时，发端于19世纪末的救亡思潮使得近代的报人们在创办报纸媒体时，很少有通过报纸媒体获取经济利益的考量；并且，由于报人或者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绅商，或者得到了某些来自各种渠道的经济支持，而此，通过经营报纸媒体获取经济利益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为了实现办报救国的理想，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惜赔本。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报纸媒体的最主要因素，无疑就是报人。报人利用在社会中享有的资源以及所掌控的话语权，借助报纸媒体向读者和公众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报人的价值观念、知识储备、道德状况等对其所经营的报纸媒体产生着无法忽视的影响。因此，对于报人的分析和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

①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6页。

② 近年来，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被海内外史学界尝试应用于中国史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成为审视历史的重要理论视角。当然，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怀疑，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上的理论抽象，是否能够跨文化地适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之中。但是无论如何，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来看，至少，“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乃是一种知性的分析方式，虽然它也是从特殊的经验事实提炼而来，但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使其可以超越文化和历史语境，有效地说明跨语境的历史中某些共同的、普遍性的要素和特质。哈贝马斯的理论对于探讨《大公报》与转型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近代出现的《大公报》是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出现的重要标志，亦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要研究报纸媒体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就离不开对于报人的分析与把握。报纸媒体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报人。他们既是报纸媒体的编辑者、主导者，同时也是知识、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此外，更应当强调的是，近代的大部分报人，除了具有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色彩之外，往往还是颇具传统忧国忧民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那个混乱与希望并存的年代，不仅赋予了知识分子更多的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危难感、焦虑感和使命感，更塑造了他们百折不挠、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积极态度。不管是政治上的出谋划策、经济上的探索尝试、还是对于开启民众智识等问题的积极探讨，其实都是他们为求得民族独立富强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对于《大公报》报人来说，更是如此。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身份不一、性别有异，但却有着明显的共同点：他们是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野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见成效。与此同对，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sup>①</sup>。也正因为如此，使人们更容易认识和理解《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在发刊词中所说的“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sup>②</sup>。这一宗旨所蕴藏的精神内涵，也为以后几代《大公报》报人所执着追求和贯彻遵循。一代代有志有为者选择了加入《大公报》，以笔为器，以文为凭，观察、记录甚至评判社会中的大事小情，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他们的选择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直接促成了《大公报》的茁壮成长，扩大了《大公报》的社会价值，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曲折前行。因此，将报人和报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疑能够更为合理、生动地展现近代中

<sup>①</sup>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70.

<sup>②</sup>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国社会情景。而这也是笔者的研究动机之一。

作为历史而存在的报人们所观察、所描写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被反映的社会，是一段被呈现的历史。换言之，报人笔下的社会并不完全等同于当时历史的真实，而是一种诠释，甚至在报人选择看什么和从什么角度看以及如何评说的时候，就已经有意无意地掺杂了报人的个人感情、阅历、价值观念、道德倾向等，赋予其相当多的主观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报人对近代中国社会的阐释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一种诠释，和人们今天赋予历史的新内涵、新意义从某些角度来讲并无二致。他们如何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怎样看待近代中国社会，选择什么样的评判对象，以何种角度展开评判，其实都受到来自时代和他们自身的种种制约。这本身也是历史的真实。

作为特定历史时空的人，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谁”、“什么”、“选择”、“诠释”等一系列主动、被动关系下，形成了复杂的话语交往空间。这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不同于近代逐渐占据统摄地位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融合，在近代中国作为权力系统的批判力量构建了生活世界（Life World）。政治、经济体系以权力和货币作为媒介，报人、报纸和在社会上所营造出来的公共话语空间则以文化为媒介，甚至构成了文人交往的社会网络。前者根植于科层制的官僚机构和经济组织中，后者则扎根于人们日常的以理解、沟通和价值获得为目标的活动中。过去，不少研究者往往是从“国家—社会”之间“压迫—反抗”的角度，单一地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并将其定义为“屈辱史”、“斗争史”。这样的预想结果，必然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某些片面的认识。而在社会史研究中，需要多层次关照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特点，尤其是从不同的层面对整个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作深入考察，进而阐明中国社会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对于媒体反应者的理解也日益成为新近媒体研究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就目前研究而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将读者定位于“受众”

的说法提出质疑。<sup>①</sup>因为这样的说法似乎将普遍或者潜在的读者置于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接收者的位置。这使得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读者对于媒体中传达的信息总是全盘接受，没有一点置疑吗？难道他们无法以自己的力量参与和引导媒体的发展吗？事实上，就《大公报》而言，虽然其在很大程度上以启蒙者自居，但不论是为了检视启蒙的效果，或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完全可以通过该报的“来稿”、“来函”、“附件”等栏目，看到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身份的读者广泛而积极地努力参与国家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甚至提出建议。读者通过阅读报纸、参与讨论的方式，形成了一个阅读公众的群体，“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sup>②</sup>，并反过来对社会发展形成一定的助力。就这一点而言，舍“受众”而称“读者”，似乎更能够体现出这一群体在报纸媒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探讨《大公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时，就必须深入分析《大公报》所面对的读者（对象），特别是读者群参与等问题。当《大公报》进行宣传和流通时，报人们预设的前提是，潜在的读者群体可以进行适当的阅读，并且可以对报纸中传达出来的信息给予一定的回应和反馈。这也就是《大公报》试图形成报纸媒体编者、文章作者（这二者有时也可能合而为一）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重要原因。譬如，通过“来函”或者来信，不仅可以将部分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呈现在更多的读者面前，而且能够表明读者对于报纸信息是理解的或至少说是有所回应的。这足以说明报人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而这同时也恰恰可以表明，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报纸媒体的宣传和传播功能，向社会展现着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用这种方式表现出自己并非一个完全被动的群体，“读者是根据文本制造出意义的主动制造者，而不是已构建成功的意义的

---

<sup>①</sup> 参见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第106~107页。其中涉及对于哈贝马斯理论中有关大众观点的批评。

<sup>②</sup>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被动接受者”<sup>①</sup>。尽管相比较报人们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而言，大部分读者还是报人们发动（Motivate）的对象，但同时这些被发动的读者也努力表达出他们参与信息传达和社会发展的愿望和诉求，或者至少说他们希望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与态度。读者对某一信息的同意或者反对，形成或加深了读者和报纸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是反映了知识生产者 and 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过程。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以《大公报》为中心对近代中国社会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那就是《大公报》主要通过文字“再现”（Represent）于纸上的近代中国社会，同真正存在过并且已成为过往历史的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着某种差距，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大，应该如何把握这样的差距，如何看待这种差距？对于剖析近代中国历史重大事件的文章、著作之作者来说，这显然十分重要。但是对于拙作来讲，似乎可以给予例外的解释。作为一种貌似客观、公正的媒体传播手段，报纸本身应该是中性的，但报人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或多或少会决定和影响报人的立场和观点，左右报纸媒体的价值评判，至少对报纸所刊载的内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sup>②</sup>。据此标准加以判断，《大公报》亦应被视为“一家之言”，它选择报道这件事情而忽略那件事情，选择此一主题加以论说、传扬而驳斥彼一主题，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阶级、历史的印痕，并且毫无例外地受到报人这一群体或个人的立场、观点乃至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生活经验等主观倾向的影响。这样一来，报人在进行最初的编辑时，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选择和取舍的倾向性。本书中笔者希望能够同时关照两条线索：关注历史事实和关注历史事实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文献和文献分析。换言之，关注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过程，是

<sup>①</sup> R. C. Allen 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1989, p260.

<sup>②</sup>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对报纸记载文字的再诠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再生产过程。“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进行编码，通过将事件置于赋予它们以不同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语境之中，媒体赋予事件以不同的阐释。”<sup>①</sup>

因此，报纸中所展现的社会百态，固然不排除其真实、客观的一面，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报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加以切割、扬弃、整合，而再现出来的“真实”。它以其包含的丰富内容构建了一个社会现实，向读者群体提供了一种观念，而读者则往往相应地根据媒体提供的“参考架构”(Frame of Reference)来阐释和认识社会现象与现实。

因此，对于任何一位历史研究者而言，“真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标准，主观性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无法抹煞的。本书在利用《大公报》的资料时，也会尽可能地引用同时期其他史料或者媒体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及其学术成果，尽量弥补使用单一史料可能造成的偏差，以求达到尽可能的全面和客观，避免造成二度切割。同时，笔者对“再现”(Representation)这样一种奇妙的现象也十分感兴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再现”？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再现”的产生？这种“再现”背后又隐含着什么样的意义？为回答上述问题，不仅应当把《大公报》作为进行研究时所依据的史料，同时还应将其作为被研究的“文本”(Text)。不应把“文本”看作是“具有其自身意义和对所有读者产生相似影响的一种自足的独立体。相反，它被认为具有多种潜在意义，有很多方式能够激活这些潜在意义”<sup>②</sup>。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借助《大公报》去观察和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分析和处理《大公报》中隐含的价值观和倾向性及由此形成的“再现”等一系列问题。

## 第二节 有容乃大——学术回顾与研究现状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前人的既有研究成果之上，才能

① 【美】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18页。

② R. C. Allen 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p269.